

从敦煌古钞到大宰府木简

——唐代科举类书在日本古代对策文整理研究中的学术价值

孙士超

摘要：唐代科举类书《兔园策府》与《魏徵时务策》在日本古代对策文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敦煌本《兔园策府》与大宰府出土记载《魏徵时务策》的木简等资料与平安初期《经国集》所收对策文的比较分析，发现这两部类书在文本校勘、文体模仿、思想影响等方面对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对策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表明，唐代科举类书不仅是日本古代士子撰写对策文的范本来源，也是理解日本律令制下科举制度运作与汉文学接受的重要媒介，凸显了中日古代制度互鉴与文化交融的深刻性。

关键词：《兔园策府》；《魏徵时务策》；日本对策文；敦煌古钞；大宰府木简

引言

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催生了服务于“试策”环节的类书编纂，《兔园策府》与《魏徵时务策》便是其中的代表，它们不仅是唐代科举文化的核心载体，亦是中原制度文明东传日本的关键媒介。敦煌石室宝藏的发现使《兔园策府》残卷重见天日，其文本、成书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大宰府木简的出土（1973年）则确凿证实《魏徵时务策》至迟在奈良时代（710—794）中后期已传入日本并被“书生”阶层学习使用，其版本、东传时间及在律令注释书《古记》中被引作制度说明的情况亦得到初步探讨。然而，当前对两部类书在日本古代对策文整理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关联与协同问题，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

具体而言，虽有学者指出《兔园策府》对日本对策文存在影响并列举个案，但对其作为综合性范本在日本士子撰写对策文过程中被接受、模仿的深度与广度——尤其是在提供议题范例、写作模板及校勘依据方面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尚待深化。^①同样，关于《魏徵时务策》的内容如何具体渗透至现存日本对策文的肌理之中，其权威对策文形式与实用文风对日本士子创作产生了何种实质性影响，以及其与《兔园策府》在日本科举文化接受中是否存在互补与协同效应，相关探讨相对较为薄弱，缺乏基于文本细读的系统关照。^②

事实上，这两部类书共同构成了日本律令制下模仿唐制建立科举（贡举）时，参加应试的士子应对“策问”所依赖的核心知识资源和写作范式来源。《兔园策府》提供了广泛的议题与结构模板，《魏徵时务策》则以名臣撰写的聚焦“时务”的权威范本著称。二者在日本上代对策文研究中具有双重关键价值。首先，敦煌本《兔园策府》为校订日本传世对策文提供了来自中土古钞本的权威依据；其次，两部类书的语句、句式、结构及其所体现的批判浮艳、主张文理兼备的实用文风被日本对策文广泛模仿、化用，深刻影响了其创作风貌与文学观念。

通过系统整合敦煌文献、大宰府出土木简与日本传世汉籍三重证据链，揭示《兔园策府》与《魏徵时务策》如何在文本校勘、写作范式、议题思想及科举实践等多层面协同塑造日本古代对策文。同时，通过钩沉两部类书东传、应用的实证，诠释汉籍作为制度、知识与文学载体在“书籍之路”上的核心作用，不仅为域外汉籍研究及中日制度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与坚实支撑，而且为日本古代对策文文献的精细化整理奠定可靠基础。

一、敦煌古钞《兔园策府》与日本古代的对策文研究

^①参加孙士超《敦煌本〈兔园策府〉与日本古代对策文研究》，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16年第4期，第17—24页。

^②葛继勇《佚存日本的〈魏征时务策〉钩沉》，载《文物》，2013年12期，第81—86页。

（一）《兔园策府》的成书及其东传日本

关于敦煌古钞《兔园策府》的成书时间，学界曾提出贞观七年至上元年间（633 - 676）等多种推测，或据蒋王李恽生平^①，或依写本避讳特征^②，然均存疑议。《杜嗣先墓志》的发现成为关键突破。《墓志》明确记载杜嗣先任蒋王僚佐在显庆三年至麟德元年（658 - 664），恰与其“少好经史兼属文”的学术盛年重合，恰好佐证了《困学纪闻》“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之说，可确证《兔园策府》成书于 658 - 664 年间，属唐高宗执政初期科举文化勃兴的产物。该书甫一问世即在士子间广泛流传，并且为其东传奠定了基础。

《兔园策府》东传日本的时间与路径亦获实证。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76 年编）最早著录该书，表明其传入日本应早于 875 年的冷然院火灾。而《杜嗣先墓志》所载长安二年（702 年）其参与接待日本第七次遣唐使一事，提供了更加精确的时空坐标。适逢日本《大宝律令》（701 年）颁行初期，该期遣唐使的核心使命即为考察唐制，新建立的科举制度当属关注重点。杜嗣先作为该书撰者，极可能直接向使团馈赠了该书，或允使团在唐购得了该书抄本，并于 704 年归国时舶载回国，当属合理。由此判定《兔园策府》至迟于 704 年就已经传入日本。

该书在日迅速传播，并融入了律令教育体系。《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将其与《文心雕龙》《文选》同列“总集”类，彰显官方的重视程度；《养老令》规定进士科需考《文选》的背景下，《兔园策府》因其策问范式与治国议题（如“征东夷”对应《经国集》“治御新罗”）的高度契合，被官私学校广泛采纳为科举教材。^③

综上，《兔园策府》作为唐代科举类书的典范，成书于高宗显庆至麟德年间，随第七次遣唐使于 8 世纪初东传日本，深度参与塑造了律令时代科举试策的文体规范与知识体系，成为中日书籍之路上的重要精神载体。

（二）敦煌本《兔园策府》在日本古代对策文整理研究中的价值

（1）文本校勘的权威依据

敦煌本《兔园策府》残卷 S.614（图 1）、S.1086（图 2）等虽仅存序文及卷一所载五篇策问，却为日本《经国集》所收奈良平安时代对策文的校勘整理提供了关键参照。兹举具体典型案例进行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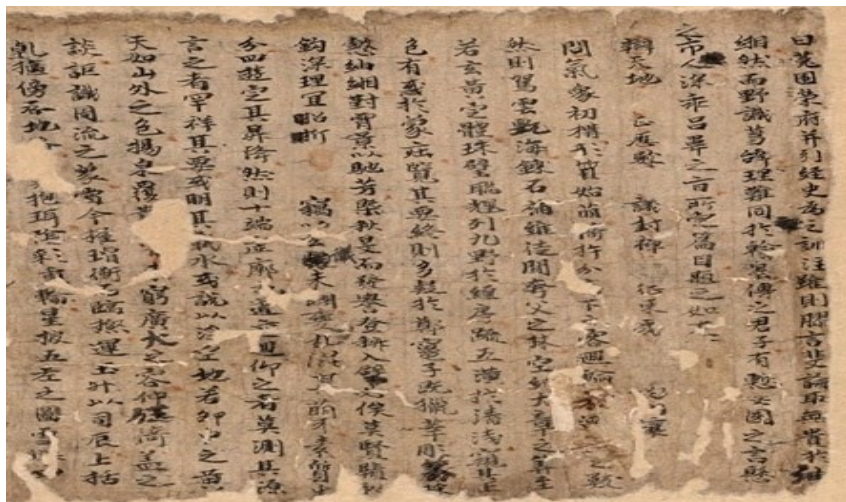


图 1 斯 614《兔园策府·卷第一並序》（部分）

^①王国维《唐写本《兔园策府》（残卷）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014-1015 页。

^②屈直敏《敦煌本〈兔园策府〉考辨》，载《敦煌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126-129 页。

^③那波里贞『唐代社会文化史の研究』，創文社，1974 年，第 217 頁。



图2 斯 1086 《兔园策府·卷第一並序》(部分)

1. “禹麾”校讹。《经国集》卷二十神虫麻吕对策文载：“设禹麾而待士，坐尧衢以求贤。”^①其中“麾”字，日本通行本（《群书类从》等）多讹作“虞”字。小岛宪之虽指出“禹虞”（指夏禹、虞舜）与“设”字语义不通，主张从神宫文库本作“麾”（军旗），然未进一步溯其出典。^②考察敦煌本《兔园策府·序》发现，其正文“执禹麾而进善，坐尧衢以访贤”之表述，不仅确证“麾”字为正，更揭示神虫麻吕文文化用此句式（仅改“访贤”为“求贤”）。
2. “秋旻”辨正。同篇神虫麻吕文：“焕焉在眼，若秋旻之披密云。”^③通行本“旻”讹作“昊”。考《尔雅·释天》“秋为旻天”，《初学记》则载“昊天”指夏空，故“秋旻”特指秋季天空。小岛宪之曾据仲雄王诗断言“秋旻”系日人“造语”^④，此说有误——陶渊明《自祭文》已有“悠悠高旻”之例。敦煌本《兔园策府·辨天地》“概秋旻而发誉”一句，既佐证“秋旻”为中土固有词汇，亦印证三手文库本为善本。

（2）文体范式的直接来源

敦煌本残卷揭示了奈良时代对策文对《兔园策府》句式与结构的模仿，具体表现为，一是类句化用。神虫麻吕文“逖览玄风，遐观列辟”句式，见于骆宾王对策文“遐观素论，眇观玄风”，更与《兔园策府·议封禅》“眇观列辟，逖览前王”高度相似。此类四字对仗句式频现于日本上代文献（如《怀风藻·序》），表明其已成为对策文创作的固定范式。二是篇章仿写。王晓平考证指出：刀利宣令对策文结尾“东游天纵，犹迷两儿之对；西蜀含章，莫辨一夫之问……况乎末学浅志，岂能备述”，实为《兔园策府·辨天地》结尾“夫以东游天纵，终迷对日之言；西蜀含章，竟诮盖天之论……末学庸能，良难备述”的改易。二者同用孔子辩日、扬雄困于天问之典，谦辞句式亦完全一致。^⑤由此，可以说，此类密集仿写进一步证实《兔园策府》被日本士子视为策文创作模板的事实。

（3）议题设置与制度关联

《兔园策府》卷一收录的五篇策问主题，深刻影响日本试策的命题取向，敦煌本《兔园策府》与《经国集》所收对策文议题的对照关系，请参考表1所示：

^①与謝野寛、政宗敦夫等『日本古典全集第一回·经国集』，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6年，第196頁。
^②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下)』，塙書房，1965年，第1438-1440頁。
^③与謝野寛、政宗敦夫等『日本古典全集第一回·经国集』，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6年，第196頁。
^④小島憲之『国風暗黒時代の文学·補篇』，塙書房，2002年，第479頁。
^⑤王晓平《日本奈良时代对策文与唐代试策文学研究》，载《中西文化研究》，2009年第12期，第84-95頁。

表 1 敦煌本《兔园策府》议题与《经国集》所收对策文议题对照表

《兔园策府》议题	《经国集》对应策题	关联性
辨天地	菅原清公问、栗原年足对《天地始终》	宇宙观与政治哲学
议封禅	同篇《宗庙禘祫》	礼制与王权合法性
征东夷	纪真象《治御新罗》	边疆经略与外交策略

（4）文风思想的跨海传承

除了上述议题的借鉴之外，《兔园策府·序》的文学批评观还直接影响了日本文论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对浮艳文风的批判。杜嗣先指斥魏晋以降对策文“文皆理外之言，理失文中之意”，主张回归汉代“文不滞理，理必会文”传统。二是平安文坛的具体回应。都良香在策判中强调“若理失通允，则文无依托”，批判“骈枝有损于翰林”，倡导“言贵在约，文不敢多”，与杜嗣先“剪浮言而体要”思想一脉相承。三是文学史观的延续。《经国集·序》“虽齐梁风骨已丧……沿浊更清”之论，承袭唐初史家（含魏徵）对六朝文风的评价^①，形成以《兔园策府》为媒介的文论东渐链条。

综上，可以说敦煌本《兔园策府》的发现，为日本古代对策文研究开辟三重维度：一是文献学价值。校正传本讹误，如前文所述，“禹麾”“秋旻”的例子，就提供了早期文本实证例子；二是文体学意义。揭示句式模仿与结构借鉴的创作机制；三是思想史关联。串联唐代科举文风改革与日本平安文学批评的跨海互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以降该书在中土失传，反使其东传版本成为研究唐代科举文化的“活化石”。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整合敦煌写本、日本古钞与出土木简，深化对唐代类书在东亚文化圈中传播路径的认知。

二、魏征《时务策》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对日本科举试策之影响

（一）大宰府木简所见《魏徵时务策》考述

1973 年大宰府遗址发掘出土的奈良时代中后期习字木简中，两枚关键残简为研究《魏徵时务策》东传提供了实物证据，其中一枚明确墨书“特进郑国公魏徵时务策壹卷”，另一枚残存“郑国公务务”“魏徵”字样（图 3）。^②根据伴出陶器类型学断代及同批“书生”字样木简，学者佐藤信判定其为日本地方下级官吏的习字材料，印证该书在 8 世纪中后期已成为律令制下科举备考的重要参考。^③

^① 王晓平《亚洲汉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7 页。
^② 有关木简的发掘和《魏征时务策》木简情况请参阅日本九州历史资料馆《大宰府史迹出土木简概报》（1），昭和 51 年（1976）3 月；葛继勇《佚存日本的〈魏征时务策〉钩沉》，载《文物》2013 第 12 期，第 81-86 页。
^③ 佐藤信『日本古代の宮都と木簡』，吉川弘文館，1997 年，第 422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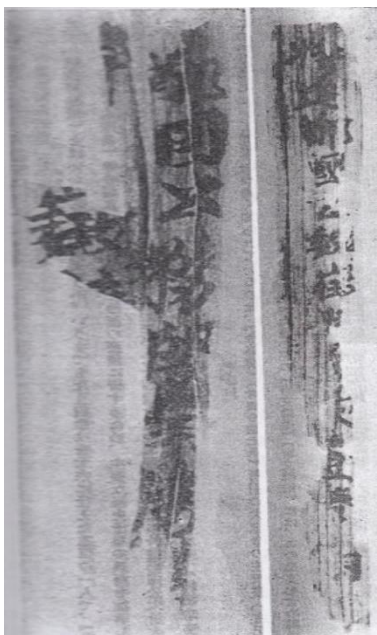


图3 大宰府出土木简

木简称谓“特进郑国公魏徵”与传世文献的记载高度吻合。《新唐书·魏徵传》详载其受封郑国公、拜特进并主持编修五代史序论的事迹；麟德元年（664）成书的《广弘明集》卷六提及“唐特进郑公魏徵策”；《新唐书·艺文志》更明确著录“魏徵时务策五卷”。以上文献所记不仅确证作者身份，更表明该书在唐代的权威地位。其文本性质当属魏徵亲撰的时务策论专集，并非后世伪托之作。

该书在中土早已散佚，然据官私目录记载可考其版本流变情况。《新唐书·艺文志》“丁部集录”载“魏征《时务策》五卷”，《宋史·艺文志》“别集类”载“魏文正公《时务策》五卷”，“杂家类”载“魏征《时物策》一卷”（物为务之讹），《通志·艺文略》“别集四”载“魏郑公《时务策》一卷”。以上记载说明唐宋时期至少存在“五卷本”与“一卷本”两种版本。平安末期藤原师通《后二条师通记》记载其于宽治五年（1091）借阅藤原道长手书《时务策》三卷（注“不见注”），次年复得二卷。^①此“注不见”的标注揭示，当时日本并存“带注本”与“无注本”，而道长手抄本当属后者。东野治之据此推测，一卷本或为无注本，五卷本为有注本。^②大宰府木简“壹卷”与《宋史》《通志》一卷本记载契合，表明奈良时代传入的当为一卷无注简本；镰仓时代僧侣著作征引《时务策》注文之事，则证明五卷有注本后来亦传至日本。

关于东传时间，木简所属的奈良中后期（约8世纪中叶）与日本最早征引该书的典籍《古记》（《大宝律令》注释书，约成于天平十年/738年）共同锁定其传入下限为738年。这一结论既合理解释了木简文本的出现，亦揭示了《魏徵时务策》作为“登龙门”考试的核心教材，在律令制形成初期已被吸纳进日本科举体系之中。其流传轨迹从奈良习字木简到平安贵族的私藏，再到镰仓禅林注疏，这一流播轨迹生动地勾勒出唐代策论文本在东亚的持久生命力。

（二）《魏徵时务策》对日本古代对策文的影响

^①藤原師通撰『後二条師通記』，岩波書店，1957年，第139頁。

^②東野治之『大宰府出土木簡に見える「魏徵時務策」考』，載《正倉院文書と木簡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77年，第162—173頁。

《魏徵时务策》东传日本后，深度参与了律令时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创作的形塑过程。其影响首先体现在**制度建构层面**。《令集解·考课令》明确引述该书定义进士科“时务策”为“治国之要务”，此举不仅确立其官方阐释权威，更凸显出日本对唐代策论范式的选择性吸纳——虽将试策条数由唐制五条缩减为两条，却将魏徵文本升格为科举标准。可以说，这种“减量提质”的改造，反映了日本律令制对唐文化的消化吸收策略，即以经典文本的精要性来弥补本土士子汉学素养的局限。

其次，在文本创作层面。《经国集》所收 26 篇对策文呈现出对《魏徵时务策》的系统性模仿。^①道守宫继《调和五行》中“弘之以德，救之以道”直接承袭自魏徵“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四字句式结构；其“巍巍之化，荡荡之风”更近乎对佚文“荡荡之化，魏魏之风”的语序调换。尤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作者两篇对策文（《调和五行》《治平民富》）竟化用自魏徵同一条佚文，这表明日本士子对该书的精熟程度已经达到了“引经据典如己出”的境界。类似仿写广泛见于奈良平安时代对策文作品。例如船沙弥麻吕《郊祀之礼》“明之鲁策，著在周篇”套用“著在虞书，显于鲁册”的对仗程式；藏伎美麻吕《赏罚之道》“清靖之风斯在，邕熙之化可期”则化用了“荡荡之化可期，魏魏之风斯在”的句型。这种密集的文本复制，暴露了日本官人在骈俪文体创作中的能力焦虑——以魏徵策论为“范文模本”，实为应对科举文体严苛要求的最为实用的策略。

第三，更深层的影响在于文风层面的革新。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批判六朝“意浅而繁，文匿而彩”的浮艳文风，主张融合江左“清绮”与河朔“气质”以达“文质彬彬”，其在《群书治要序》中更痛斥“兢采浮艳之词”的积弊。^②这一实用主义文学观通过《时务策》植入日本奈良文坛。《经国集·序》：“虽齐梁之时，风骨已丧，周隋之日，规矩不存，而沿浊更清，袭故还新，必所拟之不异，乃暗合乎曩篇。”王晓平指出这一观点“承袭了初唐史学家对六朝文风的评价，提出应该树立新文风以发展日本汉诗文”的主张。^③而百济倭麻吕《鉴识才俊》则以“岁星可谈，占风雨而仰款；竖亥雨步，尽入提封之垠”等四字单句为主、仅一处六字隔句对的简练行文，彻底跳脱六朝骈俪窠臼，生动践行了魏徵“掇彼清音，简兹累句”的主张。这种文风转型绝非偶然——当日本对策文普遍减少典故堆砌、弱化声律拘谨时，恰与《时务策》佚文质朴明畅的风格形成了跨文化共振。

概言之，《魏徵时务策》在日本的传播史，是一部制度规范、文本实践与美学思潮的三重变奏曲。它既是律令科举的“标准答案”，又是文体创作的隐形模板，更是推动日本汉文学由绮丽转向质实的关键杠杆。其价值远超普通汉籍东传，实为唐代政治文化与文学精神在东亚的深层次植根。

三、协同与升华：唐代科举类书在日本对策文中的互动机制

（一）互补性功能的结构化呈现

《兔园策府》与《魏徵时务策》在日本科举文化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层级化互补体系，具体指，

1. 知识框架与权威范本的分工。《兔园策府》以“辨天地”“议封禅”等议题提供命题模板，塑造日本策问的宏观结构（如《经国集》中“治御新罗”对应“征东夷”）；《魏徵时务策》则以“导之以德”“荡荡之化”等句式成为写作范本，直接供给措辞资源（如道守宫继对文的四字句套用）。

思想观念的共振强化

2. 二者共倡“文理兼备”的实用文风。《兔园策府·序》批判魏晋“文皆理外之言”，《魏徵时务策》实践“简兹累句”的书写原则，共同推动日本对策文脱离六朝浮艳窠臼。平安初期都良香“言贵在约”的策判标准与《经国集·序》“沿浊更清”的宣言，实为对两部类书文论的双重回应。

^①小島宪之考订《经国集》所收 26 片对策文均为进士科时务策。参见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出典論を中心とする比較文学の考察》，塙書房，1966 年，第 1423 頁。

^②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撰，吕效祖、赵宝玉等主编《群书治要考译》第一册，团结出版社，2011 年，第 17 页。

^③王晓平《亚洲汉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87 页。

3. 典型案例。刀利宣令对策文仿《兔园策府》用典结构（孔子辩日+扬雄天问），同时承袭《魏徵时务策》单句对形式，体现两类书在单篇文本中的融合。

（二）科举实践中的协同运作

日本律令制通过制度设计将两类书纳入科举体系：

首先，在教育层面。《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将《兔园策府》归入“总集”类，与《文选》并列，确立其官学教材地位；大宰府“书生”木简证实《魏徵时务策》为地方官吏习字范本，反映其在基层教育的渗透。

其次，在考试层面。《养老令》规定进士科试时务策两条，其精简性（较唐制五条）要求士子精研范本——《兔园策府》提供破题思路（如“天地始终”对应宇宙观论述）；《魏徵时务策》则赋予“义理慥当”的具体表达（如“弘之以德”的治国逻辑）。

（三）东亚汉文化圈的传播学意义

通过以上考察，两部类书的东传轨迹深刻揭示了唐代知识体系在东亚的分层接收模式，这一模式如下表所示：

表 2 两部类书的东传轨迹揭示唐代知识体系在东亚的分层接收模式

传播层级	《兔园策府》功能	《魏徵时务策》功能	日本本土化表现
制度层	科举议题库	时务策定义权威	《令集解》引为制度注释
知识层	类书式知识整合	名臣策论范式	对策文仿写与议题移植
思想层	批判浮艳文风	实用文风实践	都良香文论、《经国集·序》

这一模式表明，日本奈良平安前期对唐文化的吸收绝非简单复制，而是通过对经典进行“筛选”。比如减少试策条数但升格魏徵文本。或者进行功能重组，例如，将类书拆解为“议题库”，从而实现创造性转化。这一模式，也为后来形成所谓的“和魂汉才”，提供了一个早期的文化吸收范式。

结论

本文通过整合敦煌写本、大宰府木简与日本汉籍三重证据链，系统揭示了唐代科举类书对日本古代对策文的深层次塑造。

首先，学术价值的再确认。具体体现在一下三个维度。一是文献学维度。敦煌本《兔园策府》成为校勘日本传世对策文的“原典密码”。例如校正“禹麾”“秋旻”之讹；大宰府木简补全《魏徵时务策》东传的实物证据，将其传入下限锁定于 738 年。二是文体学维度。两种类书分别提供“骨骼”（议题框架）与“血肉”（句式辞藻），共同构建了日本古代对策文的文体基因。三是思想史维度。初唐“文质彬彬”的实用文风，经两种类书媒介的植入，催化出了平安时代初期文论的经典转型。

其次，文化传播范式的提炼。两部类书的协同作用体现了“模板-范本”的二元传播机制，一是《兔园策府》作为知识模板，提供可扩展的议题结构；二是《魏徵时务策》作为写作范本，输出可复制的表达程式。二者共同构成了日本律令制下科举文化的“操作系统”，其成功运作表明，汉籍东传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文本的移植，而在于提供可本土化重构的方法论资源。

第三，东亚科举文化圈研究表明，唐代科举类书在日本的接受史，为东亚汉文化圈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察视角，首先，书籍之路的深层逻辑。汉籍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制度理念的“压缩包”，其传播效果取决于接收方的接受能力——日本通过“减量提质”（精简策问条数但强化范本地位），从而实现高效接收。其次，未来进一步研究的路径，一是横向比较朝鲜半岛、越南对同类书的接受差异；二是纵向追踪日本中世禅林对唐代类书的注解转型；深化

“木简—写本—刊本”证据链的跨学科整合。

要言之，《兔园策府》与《魏徵时务策》如同双轨，推动唐代科举文化在日本的着陆，前者铺设议题之轨，后者驱动文辞之轮，最终在奈良平安时代的沃土上，孕育出兼具唐风雅韵与和式精魄的对策文学之花。其遗产不仅存于故纸，更烙印于东亚文明对话的基因序列之中。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